

台港文学主流



田锐生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田锐生 著

台港文学主流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港文学主流/田锐生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4(2008.7重印)
ISBN 978-7-81041-315-2

I. 台… II. 田… III. 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776 号

责任编辑 侯惠娟

封面设计 王 雷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开封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405 千字 印 数 24001—25000 册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如果请名人作序真能提高一本书的身价的话,那么,我想我会不惜血本去某个名人那里求得一序。然而,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我在平时的阅读中发现,有不少名人作序的书,序言所说与书中所写之间存在着很远的距离。读罢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书的内容有愧于书前的“圣言”。这样,书的身价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得全书虎头蛇尾,让人遗憾。我知道自己的这本小书水平不高,因此,为了避免有愧于“圣言”的现象再次发生,就自己作个小序吧!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蛇头蛇尾至少比虎头蛇尾更协调些。

提起台港文学,不少大陆人总是先摇其头,然后喟然叹曰:台港只不过有一些通俗流行的东西罢了,哪会有真正的文学?“男有金庸,女有琼瑶,不男不女有三毛。”一句顺口溜就把整个台港文学都给打发了。其实,这是一种可怕的无知与偏见,如若你对台港文学稍微作一点深入的了解,相信你会对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感到羞耻。在台港,尤其是在台湾,不仅有“真正的文学”,而且文学成就之高,足以让人震惊。如林海音、纪弦、钟肇政、白先勇、余光中、洛夫、陈映真、黄春明、刘以鬯等小说家和诗人,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足以称得上大家。他们的作品与大陆同时期的作品相比,虽不敢说高出一筹,但至少是不分伯仲。这样的横向比较也许没有意义,因为海峡两岸“本是同根生”,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台港文学的成就不凡罢了。

我们经常把台港并称,但这决不意味着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同属一类。当然就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它们是一致的;但是具体说来,台、港在文学观念、文学形态、文学思潮和流

派、作家队伍的素质与构成等不少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台湾文学就其成就而言比香港文学要大得多,它始终以严肃文学为主流,几十年中涌现出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80年代后,“新生代”作家群的破土而出,预示着台湾文学将有着让人乐观的前景。香港文学则不同,由于香港百多年来一直受英人统治,西化之风日盛,因此,商品化的通俗文学一直十分流行,即使是像刘以鬯这样的大家,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写那些“娱乐别人”的作品,来换取生活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这样,严肃文学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处境比较艰难。尽管如此,香港文学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九七”临近,香港回归祖国指日可待,相信这会成为香港文学大发展的契机。

大陆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时间虽然不长,但成就斐然,文章和专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广州、北京、上海、福建等地,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先后创办了《海峡》、《台港文学选刊》、《华文文学》、《四海》等专门推荐和介绍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期刊。不少大专院校开设了台港文学课程。海峡两岸文学的交流也日趋频繁和深入。目前,台港文学的研究已形成以广州、北京、福建三个中心为起点,向全国各地辐射的态势。

我接触台港文学的时间很短,直到1993年秋,才第一次为学生开设“台港文学”的选修课。因此,与兄弟院校的同行相比,我显然是个后来者。“后来者居上”的可能性当然不存在,但经过努力,把自己与同行之间的距离稍微缩短一些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是为序。

作者

1995年4月10日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台湾文学

第一章 台湾文学发展历程述略	(1)
第一节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2)
第二节 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8)
第二章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16)
第一节 赖和: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	(16)
第二节 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	(26)
第三节 吴浊流:铁血铸就的“诗人”	(37)
第三章 “战斗文艺”与乡愁文学	(48)
第一节 “战斗文艺”:从中兴到末路	(48)
第二节 林海音:台湾女性作家的先驱	(53)
第三节 钟理和:“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75)
第四章 汹涌澎湃的现代诗潮	(94)
第一节 “现代诗”及其主要诗人	(94)
第二节 “蓝星”及其主要诗人	(106)
第三节 “创世纪”及其主要诗人	(120)

第五章 走向成熟的现代小说	(136)
第一节 台湾现代小说的骄子:白先勇	(136)
第二节 毁誉参半的作家:王文兴	(159)
第三节 台湾现代小说的怪杰:七等生	(179)
第四节 唱生命悲歌的流浪者:聂华苓	(200)
第五节 人物心灵的解剖师:欧阳子	(219)
第六章 再度崛起的乡土文学	(238)
第一节 “笠”与乡土诗歌	(238)
第二节 承先启后的传灯者:钟肇政	(253)
第三节 民族主义者的一代中坚:陈映真	(265)
第四节 “小人物的代言人”:黄春明	(289)
第五节 破土而出的雨后春笋:宋泽莱	(318)
第七章 多元并举的文学态势	(326)
第一节 政治文学思潮	(326)
第二节 新女性文学思潮	(342)
第三节 都市文学思潮	(366)
第四节 “新生代”作家简论	(395)

下篇 香港文学

第一章 香港文学发展历程述略	(407)
第一节 香港文学的萌芽	(407)
第二节 香港文学的发展	(411)
第三节 香港文学的性质	(414)

第二章 香港的小说·····	(417)
第一节 刘以鬯的小说·····	(417)
第二节 西西的小说·····	(432)
第三节 徐讦、徐速等南来作家的小说 ·····	(438)
第四节 侣伦、舒巷城等本土作家的小说 ·····	(449)
第三章 香港的诗歌·····	(456)
第一节 何达、舒巷城等写实派的诗 ·····	(456)
第二节 黄国彬、黄河浪等浪漫派的诗 ·····	(465)
第三节 戴天、古苍梧等现代派的诗 ·····	(473)
第四章 通俗文学·····	(482)
第一节 武侠小说·····	(482)
第二节 言情小说·····	(494)
第三节 科幻小说·····	(499)
第四节 框框散文·····	(503)
后记 ·····	(507)

第一章 台湾文学发展历程述略

1895年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统治者的这种卖国行径,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台湾人民即鸣锣罢市,愤怒的群众纷纷拥入巡抚衙门,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清政府不顾人民的呼吁,还是把台湾如期交给了日本。自此之后的50年中,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饱受了异邦统治者的武装镇压、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

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

当然,台湾新文学运动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祖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而诞生的。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场轰轰烈烈、所向披靡的民主革命运动,以它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了世界的东方。它为正在寻求民族解放新出路的台湾同胞指明了方向,于是,台湾同胞毫不犹豫地跟定祖国母亲的步伐,满怀信心地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秋,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台湾学生蔡惠如等,为响应祖国大陆的民主斗争,取“同声相应”之意,组织了“应声会”。这是台湾第一个民主运动的团体。但因“会员不多而流动性亦大,组织未久,不知不觉销声息影”(蔡培火语,转引自《台湾民族运动史》)。1920年1月11日,蔡惠如等人又重整旗鼓,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

了“新民会”，并于同年7月16日创办了《台湾青年》（1922年4月改名《台湾》）。创办者在其创刊号上宣称：“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的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他们还利用假期，组织“巡回讲演团”，返回台湾进行宣传，唤起台湾人民抗日救国情绪。后来，台湾文学史研究者把《台湾青年》的创刊视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端。

一般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和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也称台湾现代文学。我们把始于1920年，止于1945年的台湾现代文学再分为三个时期，即：从1920年《台湾青年》杂志创刊，到1927年《台湾民报》由东京迁入台湾印行，为“开拓期”；从1927年到1937年，为“发展期”；从1937年到1945年，为“战争期”。

开拓期的台湾新文学的实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白话文的广泛推行铺平了道路。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实行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与之紧紧相随，把提倡白话文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为适应这一时代需要，《台湾》杂志增加发行全部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在“增刊预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办刊宗旨：“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导学术界的动态、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家庭与学校等……”（转引自《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湾民报》创刊后积极推广白话文，倡导建立“白话文研究会”，并由超今（即黄朝琴）主持辟出白话文专栏“应接室”以研讨

普及白话文。《台湾民报》成了提倡、推动和普及白话文的坚强阵地。在推行白话文的过程中,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是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二黄”的文章主要是强调在台湾推行白话文的作用和意义,指出了旧的文言文的种种弊端。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台湾人的文化水准,汉文改革刻不容缓。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对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之后而写出的,因此文章情理并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他们把汉文的改革与发扬民族文化、反对日本同化政策联系起来,更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台湾文化界群起响应,使台湾的汉文改革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在台湾旧文学的废墟上树建起台湾新文学。在拆除台湾旧文学殿堂的过程中,张我军无疑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张我军,原名张清学,1902年生于台北县板桥镇。1923年,张我军离台到北京求学。在此期间,他亲身体验到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狂飙之势,因此,他于1924年9月写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信中写道:“诸君怎么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韵合璧的奴隶,或讲些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湾的诗文,从未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粪),想出风头,竟然自称诗翁,闹个不休。”不久,张我军又在此刊2卷24期上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他说:“这几年来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做诗的尽管做,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趣,而不但没有产生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做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出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文章的最后又说到台湾文学界:“在

打鼾酣睡的台湾文学，要永远被弃于世界文坛之外了。台湾的文士却恋着堊中的骷髅，情愿做守墓之狗，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面对张我军的频频发难，台湾旧文学界自然不甘沉默。旧诗人连雅堂首先出战，他趁替林小眉的《台湾詠史》作跋之机，讥笑道：“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

连雅堂的反击之辞，无异于为张我军树立起一个活靶子。于是，张我军又连续发表《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这三篇文章继续发扬了张我军嬉笑怒骂的文风，它们像一串连发的炮弹，把台湾旧文学的阵营炸得七零八落。张、连之战掀起了新旧文学斗争的轩然大波，这场论争以新文学的胜利而告终。以张我军为首的新文学主张在当时的台湾文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就为台湾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三，涌现出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学的理论倡导相配合，台湾文学界出现了一批用白话写成的作品。有“三杰”之称的赖和、杨云萍、张我军是当时台湾创作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自1926年1月始，《台湾民报》上相继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蕉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等小说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嫌稚嫩，但它们的开拓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们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7年到1937年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期中，台湾的新文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之一是新文学路向的转变。在本时期里，台湾新文学已从原先提倡白话文发展为提倡文艺的大众化，即倡

议建立台湾乡土文学。这明显地表现出,台湾新文学已从对语言形式的要求发展到对文学表现新的内容的强调。所谓乡土文学,就是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文学。乡土文学的最先提倡者是黄石辉,他在1930年9—11号的《伍人报》上发表了题为《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的长篇论文,文章对乡土文学的含义及建立乡土文学的必要性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到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在黄石辉的启发下,郭秋生于1931年连续在《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上发表了《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和《建设台湾话文》两篇文章。他在提倡用台湾话作为创作的主体语言的同时,还提出了台湾话文、乡土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主张。除此之外,郭秋生还创办了《南音》杂志,为他所提倡的台湾话文学提供园地。当然,也有不少反对黄石辉和郭秋生的主张,并由此引来了一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论争。论争虽然最终也未见分晓,但台湾乡土文学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使台湾文学着上了鲜明的自己的颜色。

台湾文艺团体及文艺刊物的大量涌现,是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又一标志。1934年5月6日,“台湾文艺联盟”在台中宣告成立。在此之前,台湾已出现了诸如“台湾艺术研究会”、“台湾文艺协会”等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艺社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不断发展,文艺界的人士觉得这些文艺团体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这对文艺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各地的文艺作家(包括旅居日本的)能够团结起来,则对今后的文学运动必定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基于此,居住在台中的一些作家提议召开全岛文艺大会,“台湾文艺联盟”这个具有全岛性的文艺团体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联盟”本着“联络台湾文艺家,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奋台湾文艺”的宗旨,广泛地展开了工作。它造成了台湾

作家超乎一切派别的空前团结，大大地推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

与文艺社团的发展相一致，台湾的文艺刊物也大量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31年由《台湾民报》改刊而成的《台湾新民报》，1932年1月1日创刊的《南音》，1932年3月21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的《福尔摩沙》，1934年7月15日创刊的《先发部队》，1934年11月5日创刊的《台湾文艺》，1935年12月创刊的《台湾新文学》等。这些文艺刊物为台湾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提供了园地，培育和扶植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为台湾文艺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台湾新文艺深入发展的第三个标志，是作家与作品的成批涌现。台湾新文学的创作虽然是在“开拓期”起步的，但那时的作家与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到了2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30年代之后，台湾作家的人数明显增多，作品的艺术质量日渐提高。赖和的《丰作》被译成日文，并选入《朝鲜台湾新锐作家集》。杨逵的中篇《送报夫》首获日本《文学评论》刊物1934年征文二等奖，这个作品在台湾整个新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吕赫若的《牛车》及长篇小说《台湾的女性》等，受到台湾评论界的赞扬。朱点人的《城隍爷爷恼了》、《纪念树》、《无花果》、《安息之日》等，或深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描写人民在重压下的反抗情绪，这些作品都在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里，知名作家不下百人，引人注目的作品一百多篇，这些作家和作品使得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坛热闹非凡，并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谱写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实行“战时体制”，钳制民众言论，严禁使用中文写作和出版销售中文书刊，取缔“非法”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使得蓬勃展开的台湾新文艺运动，一时陷入万马齐喑的深渊之中。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是台湾文艺的凋落期。

形势的骤然变化带来了台湾作家队伍的分化。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作家,经受不住压力成了“皇民文化”的宣扬者,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但就整个台湾文坛而言,这只能算是战争时期出现的一股小小逆流,并不代表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只能制服那些民族意识沦丧者,真正的爱国作家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与民族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以张文环、龙英琮为代表的作家,利用种种合法的手段,在文学作品中曲折地表现民族意识,呼唤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张文环的《阉鸡》,写的也不过是两个市井家庭的兴衰,可是作者用写实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台湾民俗和富于乡土气息的社会生活,形象地证实了“皇民化运动”的徒劳。龙英琮的《不知道的幸福》、《一个女人的记录》等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下层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艰辛,表现了台湾人民善良而坚毅的性格,闪烁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光辉。

以杨逵、吴浊流、巫永福为代表的台湾作家,不顾自身生命的危险,坚持爱国主义传统,以鲜明的民族立场,深刻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与敌人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杨逵的《鹅妈妈出嫁》直接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神话;《泥娃娃》暗示出日本侵略战争必败的前途。吴浊流冒死写出的长篇小说《亚细亚孤儿》,多方面地揭露了日本统治的罪行,昭示出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的真理,它是一部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巫永福则用诗歌来表达他的爱国激情。他在《祖国》一诗中写道:

国家贪睡就病弱
病弱就会有耻辱
人多土地大的
祖国哟! 咆哮一声
祖国哟! 咆哮一声

民族的尊严在自立
无自立便无自主
不平等隐藏有不幸
祖国哟！站起来
祖国哟！举起手

.....

诗中充溢着的激愤与热情，像滔滔江水，以不可阻挡之势撞击着每一个爱国人士的心！这些在高压统治之下奋起抗争的作家和诗人，不仅是台湾人民的骄傲，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综观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它与祖国大陆现代文学的走向是基本一致的。它自始至终昂扬着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主体精神，贯彻着的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方法，因此，我们说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节 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文学史上把 1945 年至今的台湾文学称为台湾当代文学。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被日本占据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1949 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台湾又孤处海上，至今同大陆处于分离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光复后的台湾文学虽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部分，但它毕竟有着独特的进程和色彩。

一、光复之初：短暂的过渡

台湾光复，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民族骄傲和喜悦，按常

理,这该是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台湾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契机。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从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文坛一片沉寂,以至被人称之为“文化沙漠”。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点:首先是政治原因。战争期间,日本把台湾作为后方基地,对台湾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疯狂掠夺,加之日本投降前夕美国空军的狂轰乱炸,致使战后的台湾成为一片废墟。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后,由于精力放在内战上,无心关照台湾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台湾“二·二八”起义之后,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全岛性的白色恐怖,致使台湾作家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惑不安。其次是作家自身的原因。由于日本在台湾长期推行“皇民化”教育,使台湾岛内中文荒废。日据时期的大部分作家是用日文写作的,战争结束之后,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用中文写作实在是困难重重,他们需要一个“跨越语言”的过程。正是因为以上两点,使台湾新文学史上出现了这一苍白的过渡阶段。

当然,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之为“苍白的过渡”,并不就是说此间全无文学活动。在此期间,台湾本土作家和由大陆赴台的文人也创办过一些文学刊物,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如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叶石涛的《玻璃泥坊》等,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的。另外台湾作家对日据时期的新文学也进行了初步总结,探讨了台湾文学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走向。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50年代的台湾文学

50年代的台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战斗文艺”和乡愁文学。

所谓“战斗文艺”是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之后,为适应其政治的需要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反共文艺。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的行政院被迫迁往台湾,随后便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